



内部读物

上尉政变后的葡萄牙

威·贝 却 敌 著
方辉盛 达 鹰 译



D755.23
1

上尉政变后的葡萄牙

威·贝却敌 著

方辉盛 达 鹰 译

广西人民出版社

上尉政变后的葡萄牙

威·贝却敌 著

方辉盛 达 鹰 译

☆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5 插页4 字数121,000

1983年2月第1版 1983年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6,300册

书号: 3113·294 定价: 0.69元

内 部 发 行

出版说明

本书根据著名澳大利亚记者威·贝却敌一九七五年手稿翻译出版。

作者贝却敌于一九七四年葡萄牙“四·二五”政变发生后第三天到葡萄牙，以后又多次访葡，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写成此书。

“四·二五”政变是葡萄牙现代史上一次重大转折。当时在内外交困、矛盾重重的情况下，一批中、下级军官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统治葡萄牙达四十多年的法西斯政权。这次政变对现阶段葡萄牙的政治斗争仍然起着重大影响。作者根据他的分析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当时各派政治力量的消长和反复斗争，揭示了他们在斗争中的一些内幕。试图告诉读者：葡萄牙为什么发生政变？为什么发动政变的是一批上尉？政变和殖民地人民斗争的关系如何？政变各方对国内外政策特别是对殖民政策方面的立场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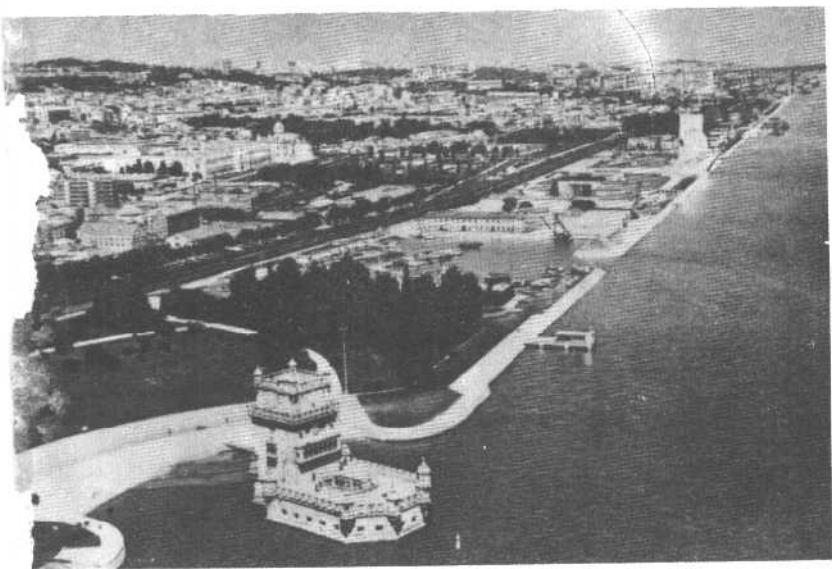
作者还用许多真实而生动的故事告诉读者：葡萄牙这个既是老牌殖民主义者，又是西欧经济落后的国家，它的一般工人、农民，特别是山区农民、海滨渔民，到底生活得怎样？它本身在“大鱼吃小鱼”的规律下又怎样受着“跨国公司”的欺压？卓别林的《摩登时代》怎样在这里再现？

作者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巧妙而有有条不紊地记叙了大量

葡萄牙的地理历史情况、民情风俗、政变前后曲折复杂的斗争场景和自己的采访经过。读后能使我们增进对资本主义世界的了解。为同国际资本主义打交道、为正确地处理同葡萄牙这样的国家的关系，提供参考。有志于新闻事业的读者，还可以从中吸取名记者的采访经验。

作者对于某些政治事件的看法，和我党的观点不尽一致。因此，此书在内部发行，仅供参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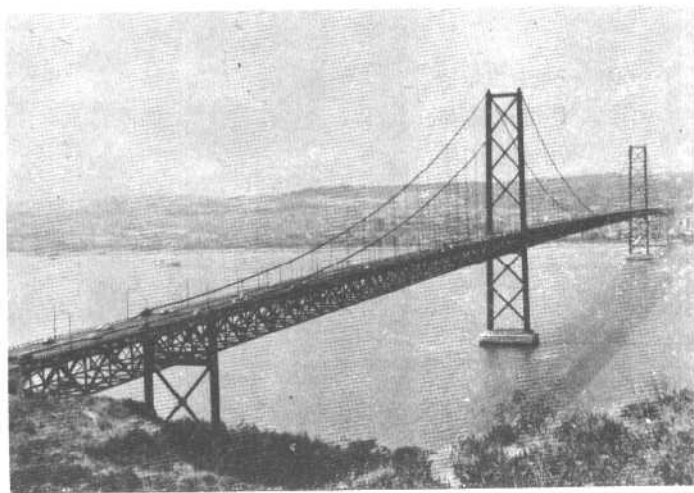
302466



① 葡萄牙首都里斯本依山傍水，是一个美丽的海滨城市，一年四季吸引着成千上万的外国游客。（新华社稿）

② 飞架在葡萄牙特茹河上的“四·二五大桥”，它是欧洲最大的钢铁吊桥。

（王志根摄）





③ 解放大道是里斯本最重要的大街。一九七四年独裁政权垮台后，许多重要的群众集会和游行在这里举行。

(新华社稿)

④ 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九日里斯本，高举横幅的青年人在大街上乘车驶进。横幅上的标语是“公审法西斯罪犯”。
(美联社传真照片，新华社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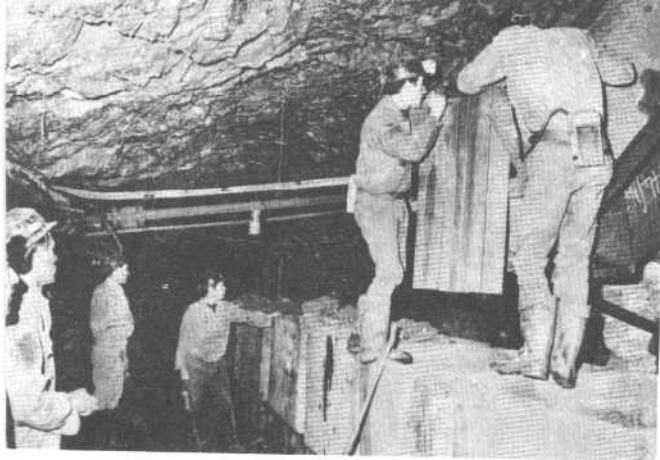




⑤ 葡萄牙军事救国委员会主席皮诺拉一九七四年五月十五日在里斯本郊区奎勒斯宫共和国总统就职仪式上发表讲话。他旁边是救国委员会成员科蒂尼奥海军上将和马奎斯将军。（新华社稿）



⑥ 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八日在里斯本，一位士兵手执插有花儿的步枪正在约束群众。（美联社传真照片，新华社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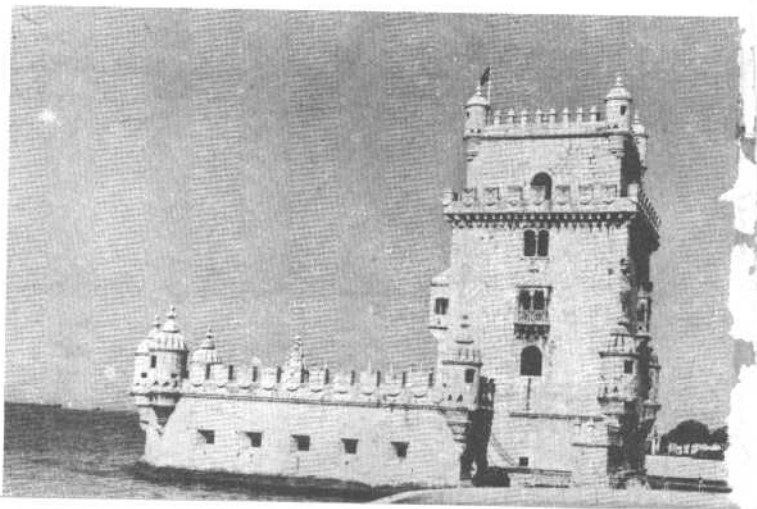


⑦ 黄铁矿是葡萄牙的主要矿产之一。这是葡萄牙的阿连特如省阿尔儒斯特雷的矿工在开采黄铁矿。

(新华社稿)

⑧ 贝伦塔座落在特茹口，建于一五一五年到一五二〇年。葡萄牙著名航海家瓦斯科·达加马一五二四年从这里起航前往印度。塔身高三十五米，登上塔顶可以眺望里斯本全景。

(王志根摄)



目 录

第一章	背景	(1)
第二章	黎明	(7)
第三章	密谋	(18)
第四章	动机	(30)
第五章	战略	(42)
第六章	战士	(54)
第七章	第一、二次反扑	(69)
第八章	组织	(81)
第九章	第三次反扑	(94)
第十章	垄断集团	(110)
第十一章	跨国公司	(119)
第十二章	阿连特如	(127)
第十三章	山后区	(139)
第十四章	意 见	(152)
第十五章	沙丁鱼	(162)

第一章 背 景

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八日，我乘坐飞机从巴黎飞到里斯本。飞机里载着各式各样陌生的乘客。实际上都是葡萄牙人，有少数知识分子，也有少数可能是商人和官员，而大多数是普通老百姓，许多人带着紧张不安的面容。他们是流亡者？是侨工？还是移民呢？里斯本机场在几小时前才宣布重新开放。这里三天前发生了结束半个世纪法西斯统治的军事政变。这是什么样的政变呢？仅仅是以军事独裁代替了法西斯独裁吗？现在国家被控制在具有不祥之兆的军政府（救国委员会）手里，会不会有真正的变革呢？是不是还有跟以前一样的公安警察来监督入境的旅客呢？坐在我前边的一位中年葡萄牙人以不安的口吻向我提出最后这个问题。他打量着我两腿间夹着的手提打字机，猜想我是一个新闻记者。可是，我对他提的问题只能耸耸肩膀。这是我第一次访问葡萄牙，我也担心安全检查，担心持澳大利亚护照还要不要入境签证。我是在电台广播里听到里斯本机场重新接纳飞机的消息后，几分钟之内就跑到巴黎的奥里机场，要求承认预订机票的有效性的。

我心里一直在嘀咕着没有签证和黄皮书，没有预订旅馆，没有与里斯本联系等等问题。“系上安全带……停止吸烟”的通知已经告诉我们，飞机正在着陆了。紧张的气氛围绕着

旅客们。飞机降落后，正在接上通向接待处的滑梯道，在这最后的几分钟，许多苍白的面孔都凑向飞机的舷窗，想要看到等待他们的是什么。

什么麻烦也没有。护照检查处的气氛就象是选举获胜的政党总部那样。没有官员，只有穿便衣的男女——这是我来往葡萄牙九次中唯一见到的情况——向护照和证件的持有者瞧一眼，对上了就在护照和证件上盖戳子。每盖一次戳子就闪出一次微笑，看到葡萄牙人就说声“胜利”，看到我和其他外国人就说声“欢迎你”。

在这种最简便的护照和海关检验之后，苍白紧张的面孔开始轻松了。于是，呼唤、眼泪、疯狂的拥抱——孩子们扑向还不认识的爸爸和叔叔。大多数旅客都卷入了亲友阔别多年重逢的激动人心的场面之中。

出租汽车司机见了人也讲“胜利”、“欢迎你”。当司机见到我的打字机时，就介绍我到蒂沃利旅馆。在那里，一位老同行突然拍一下我的脊背说：“你来了！没有碰到什么问题吧？”我叙述了机场的气氛。他说：“情况的确改变了，但是，什么东西促使你到这儿来了呢？这不是有点超出你的范围了吗？”我们以前的经历都是与亚洲问题相联系的，特别是东南亚问题。

那时，我对他提出这问题没有完满的回答。我是直觉地、天性爱冲动地赶到这里来的，就象老战马嗅到火药味就猜想要干什么那样。但火药味我倒不感兴趣，我嗅的已够多了。四·二五政变的消息使全世界，包括所有葡萄牙人都感到震惊。正象我的大多数同行一样，我喜欢到创造历史的现场。推翻一个欧洲最久的法西斯政权，我对它有职业上的兴趣，这是正常的。但是真正使我马上行动的，是政变时宣布的武装部队

运动纲领的某些部分，如果得到实施，它们具有震惊全球的含意。四·二五抛出的巨石所引起的震波，波及的范围将远远超出欧洲——在欧洲，从西班牙到希腊的反响是可预见的——而震撼整个南部非洲的政权模式。

如果象武运的中坚分子上尉们所说的那样，推翻法西斯政权的主要动机之一，是结束非洲战争，那末，这就具有惊人的重大意义。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非洲战争只能在葡属非洲殖民地完全独立的基础上结束。戏剧性的、完全没有预期到的新因素将进入非洲舞台。

我的绝大部分记者生涯是在亚洲反法西斯战争、争取独立的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中度过的。根据我的经验，几内亚比绍、莫桑比克、安哥拉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什么时候，要付出多少血的代价才能取得这种胜利呢？上尉政变看起来似乎是一条捷径。正是这一点，驱使我匆匆告别我那感到诧异的家庭，奔向奥里机场，乘上政变后开往里斯本的第一班飞机。那时，我自己的思想也还比较模糊，占据我脑海的问题更多的是要到那里去，而不是我在那里将干什么。

为什么要政变？为什么发动政变的是一批上尉？殖民国家的武装部队真的能反对殖民主义吗？政变者真的想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结束殖民战争吗？这些便是最初在我脑海里浮现的疑问。另外还有一些耐人寻味的问题，在法西斯政权尸骨未寒时就对它进行考察确是难得的。例如，这样一个政权真能在不流一滴血的情况下被粉碎吗？法国的纳粹主义、意大利和日本的法西斯主义，都是在国外有武装力量逼迫、国内有外国占领军监督的情况下才崩溃的。葡萄牙能靠自己的力量办到这一点吗？人民对“自由”这个大多数人都不熟

悉的概念又会如何反应呢？

到达目的地后一小时，我在蒂沃利旅馆所在的解放大道上散步，感到一种清新的气息。这是一个料峭的寒夜（比我原先得知的里斯本早春通常的气候要冷得多），但是街上却可以看到无数轻松愉快的、散步的人群，他们挥动着馨香的石竹花。不时还出现一群群士兵、水兵，年轻的男女手挽着手匆匆走过。人们哼着口号式的调子：“人民团结永不败”。解放大道一直延伸到普拉索多斯饭店。那里有新闻旅游部，有海军站岗。站岗的海军把石竹花插在枪上，别在紧身衣上。并且摆好姿势准备同张臂拥抱他们的任何人照相。到处是友善的气氛。人们很快发现，普通士兵已经成为今天的英雄。

对每一个新闻记者来说，首要的问题是，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怎样着手工作。正如机场出租汽车司机所知道的，蒂沃利旅馆是一个非官方的外国记者活动的大本营，尤其是那个酒吧间，按一个同行的话说，是个谣言交易所。但是，真要深入探索事实和它的来龙去脉，那就困难了。这就得接触葡萄牙人。

事情比预想的要容易。星期六一早，我在银行里出示护照兑换旅行支票，无意中碰到了新群出版社的副总编辑瓦斯科·多斯·桑托斯·马丁斯。他曾为在葡萄牙出版我的书而同我联系过。原来，人们巧妙地避开书籍检查，已经使我那些带有浓厚的支持亚洲民族解放运动色彩的书在葡萄牙广泛流传。当时法西斯的葡萄牙正用一半预算开支来粉碎其非洲领地的民族解放运动。葡萄牙军事学院把我的书作为研究战术的教科书，据说，发动四·二五政变的武装部队运动的成员普遍读过这些书。不过，阅读的效果正和制订课程的人的意图相反。武运最有威望的领导人之一梅洛·安图内斯少校后

来有一次告诉我：当年轻的军官了解到美国纵然有尖端的军事技术也不可能打败弱小的不发达国家的人民时，感到极大的震惊。有人问，如果象美国那样一个强大的国家尚且不能战胜弱小落后的国家，那么，弱小落后的葡萄牙又怎么能战胜领土比自己大二十倍、人口比自己多两倍的非洲领地呢？

见到马丁斯后，事情顺利了。他把我带到新群月刊编辑部，那儿正在忙着出版纪念四·二五政变的专刊。编辑人员拉着我说：“你不能想象，我们正在进行第一次没有新闻检查的出版工作。再没有人说我们能出什么不能出什么了。”

四月二十九日星期一，确实是个重要的日子。晚报在通栏大标题下登载了一项法令：五月一日被定为全国性的节日“劳动节”。要在全国内举行庆祝活动。当晚在蒂沃利旅馆，一位服务员端菜时突然停下来盯住我放在空椅子上晚报的大标题。他拿起报纸，其他服务员都围了上来。为了便利不识字的人，他高声朗读关于五一劳动节的通知。接着，朗读另一个标题：“财富要归劳动人民掌握，而不归银行家寄生虫掌握”。这是援引几天前从国外流放归来的社会党领导人马里奥·苏亚雷斯答记者的话。服务员们一听，惊得目瞪口呆，大加赞许。那位服务员再来供菜时对我说：“这样的话都能发表，而且公开在街上出卖，真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事。”

几天前对我表示友好的那位同行，还谈到了苏亚雷斯和葡萄牙共产党领导人阿尔瓦罗·库尼亚尔回国受到欢迎的盛况。

这只是“五一”节背景的一部分。“五一”这天，完全自发的、万众欢腾的情感空前地爆发出来。宽阔的解放大道成了一条跳动的大动脉，沿着它，一条成千上万人的人流汇

入另一条成千上万人的入流，下午三点左右汇合在里斯本体育场的旗海之下。到处都是鲜红的石竹花。作为革命的象征，石竹花甚至插到了装甲车、坦克车、机关枪上边，淹没在挤满了体育场和各条通道的几十万人的人群当中。

这是武装部队和人民的一次大会师。旗帜上的主要标语和人们呼喊的口号是：“军民团结！”“武装部队万岁！”“胜利”和“人民团结永不败！”几天前，那些参与过半世纪来血腥镇压五一节庆祝活动的警察已被赶出街道，而由武装部队来维持法律和秩序。示威好象是有意倾泻对武装部队运动的感激之情似的。人们对普通士兵表现的无比尊敬和深厚感情，消除了士兵们心灵上多年的创伤。他们回来了，成了人民的一部分。而在过去多少年，军人曾因为在殖民地镇压非洲人、在国内镇压人民而受人轻视，曾因为打不赢殖民战争、对提高本国人民生活水平出不了力而遭人白眼。而现在完全扭转过来了。

人群高举的标语牌中，工会的标语分外醒目。要求清洗法西斯政权的头子，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要求结束殖民战争等等。当潮涌般的人流拥进体育场的时候，装饰一新的、一眼望不尽的车队，鸣着“胜利”喇叭行进在解放大道上。体育场上的主要发言人，呼吁人民和武装部队团结一致，巩固推翻法西斯的胜利成果。

庆祝活动通宵达旦。凌晨，游行的人们才逐渐分散，继续进行家庭聚会或一些有组织的活动。还有些人仍一群群地拥在街道上，有汽车的人还在尽情地鸣放喇叭……

第二章 黎明

爱尔维娜·奈莱乌是一位举止文静、有着一副秀丽端庄的面容的青年妇女。当我到里斯本不久遇到她的时候，她在尤尼勒维有限公司主管一个打字员小组的工作。四月二十五日夜晚十点左右，她被一阵传递消息的呼唤声惊醒：“政变了，鼓起勇气来！”这一消息是几小时前首先由一辆汽车传出来的，这辆汽车在附近一条路上来回跑动，用一种特定的信号按喇叭来传播这一信息。按一下代表A，按两下代表B，按三下代表C，如此等等。接着在奈莱乌被监禁的卡夏斯监狱，人们通过扣击墙壁、扣击那通向大多数牢房的水管的方法，把消息传播开来。卡夏斯监狱是一座阴森的白石建筑，在里斯本以西，沿海岸约摸十二英里。因为奈莱乌住的是单间牢房，她是最后一批得到消息的人之一。而且她是监狱的新来者，不太熟悉监狱的“密电码”，所以，人们才通过她同一排牢房的窗户，最后呼喊着把消息传给她。

事后她对我谈道：“政变了？是左派政变还是右派政变呢？”几个月前谣传过库尔扎·德·阿里亚加^①要搞右派政变，是他搞的政变吗？如果是的，那我们的处境将比过去还

^① 库尔扎·德·阿里亚加将军以其极右观点而闻名，他是前莫桑比克总督，后来曾任葡萄牙空军首脑。